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研究丛书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

总 编 朱 玉
主 编 郝成铭
副主编 朱永光
麻 琨

回忆录卷

(下)

甘肃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营救西路军二三事 吴鸿宾(1)
- 关于营救西路军的回忆 吴 波(11)
- 我去河西营救西路军的经过 马宪民(13)
-
- 关于援西军的回忆 宋任穷(16)
- 接应西路军归来同志 杨国宇(18)
-
- 谢老在兰州 王定国(20)
- 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 伍修权(22)
- 怀念高金城烈士 王定国 刘德胜(25)
-
- 我参与永昌县建政工作的回忆 王泉媛(29)
- 我所知道的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建立经过 狄兴泰(31)
- 关于永昌区苏维埃政府工作的回忆 刘万祥(36)
- 我曾当选临泽县苏维埃政府主席 李国璧(40)
- 红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的群众工作 宋德和(44)
- 回忆甘州中心县委 吴建初(49)
-
- 千里跋涉找中央 李聚奎(53)
- 从祁连山到陇东 萧永银(63)
- 心向延安 陈明义(85)
- 王军长带领我们走出祁连山 饶金才(95)
- 艰苦的归队历程 李新国(102)
- 人民的恩情重如山 左 叶(104)

河西三个月	戴克林(114)
孤雁归群	龚兴贵(122)
西路寻党记	刘克先(129)
祁连山血战之后	何元吉(136)
走出祁连山以后	陈宜贵(138)
东归途中	方震(144)
历尽艰险到延安	郑维山(152)
回到党的怀抱	戴克林(155)
被俘、斗争、脱险	方强(159)
严峻的考验	黄良诚(175)
西路军失败后的归队经历	况玉纯(189)
要革命,向东走	谈清林(198)
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	刘德胜 王定国 武杰(202)
对张掖狱中党支部工作的回忆	刘瑞龙(212)
艰难曲折的东归路	谢良(215)
逃出虎口回八路	康海生(219)
死里求生见光明	张萍(221)
一片丹心向延安	耿万福(224)
党在我心中	李宽和(233)
从地狱归来	王定烈(242)
我在青海的坎坷经历	欧阳辉(250)
我离开青海的经过	苏风(259)
我是怎样逃出虎穴的	华全双(262)
艰难的回归历程	张宜友(266)
青海老乡,我真诚地感谢你们	吕仁礼(268)
骨头比钢硬	王儒云(275)
东归历险记	梁昌汉(279)

目 录

- 挣脱牢笼,踏上新的征途 王恩厚(282)
- 从援西军到一二九师 方 强(285)
- 我为西路军送过粮 李保德(293)
- 支援红西路军二三事 毛长林(298)
- 参与救治、收留红军伤病员的回忆 毛培礼(301)
- 我救助红军失散人员的回忆 徐菊香(305)
- 掩护徐一新同志的经过 屈大成(307)
- 我们救了一位红军战士 召卡什吉(311)
- 中国共产党与盛世才的关系 黄火青(313)
- 由苏联赴新疆迎接西路军 滕代远(321)
- 进新疆迎接西路军 段子俊(324)
- 在星星峡见到了党中央代表陈云同志 杨南桂(327)
- 迎接西路军进新疆随军见闻 殷百中(329)
- 王效典迎接西路军进新疆 王德辉(331)
- 红西路军左支队在新疆的回忆 张官朝(332)
- 迪化“新兵营”(节录) 吕黎平(338)
- 中央代表领导我们学习 饶子健(347)
- “新兵营”是我党培养干部的大学校 杨锡光(349)
- 忆在“新兵营”的日子 康立泽(351)
- 在“新兵营”的日子里 王崇国(359)
- 回忆新疆“新兵营” 姚德智(364)
- “新兵营”的干部大队 刘鹤孔(368)
- “新兵营”里的炮兵大队 宋承志 王德润(370)
- “新兵营”里的无线电训练班 徐明德 郑执中(373)
- 回忆新疆“新兵营”通讯训练班 胡正先(375)

- 在新疆汽车大队学习 王元喜(378)
- “新兵营”的医务工作 洪耀(380)
- 我在迪化苏联领事馆工作的回忆 聂洪国(382)
- 到苏联学习情报工作的回忆 杜发树(385)
- 在新疆蒲犁边卡大队 胡鉴(386)
- 在喀什骑兵团 周纯麟(389)
- 改造盛世才的骑兵连 谭庆荣(392)
- 周恩来、陈昌浩同志来到“新兵营” 李培基(399)
- 回延安 喻新华(401)
- 从新疆回延安 李映光(404)
- 在党中央关怀下我们回到了延安 李文华(412)
- 回忆毛主席的亲切教诲 王恩舟(414)
- 毛主席关心红军西路军指战员 康立泽(416)
- 新疆三年 黄火青(419)
- 我军首批航空人才的培训经过 吕黎平(429)
- 难忘的新疆航空队 袁彬(452)
- 在新疆航空队的日子里 刘忠惠 张毅 云甫(463)
- 在新疆航空队学习飞行机械 金生(467)
- 在陈潭秋同志身边工作 徐明乐(470)
- 狱中斗争 吕黎平(473)
- 狱中怒火 谢良(480)
- 新疆监狱斗争中的秘密联络工作 刘护平(485)
- 党中央营救我们回延安 方槐(490)
- 从延安到东北航校 金生(497)

目 录

- 营救被关押在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 屈 武(501)
- 从新疆护送共产党人回延安的经过 刘亚哲(506)
- 我在河西五十年 阎保禄(519)
- 河西人民是我的再生父母 岳仲连(525)
- 民乐人民是我的亲人 向如沛(532)
- 劫后余生 何福祥(535)
- 西路军失败后的遭遇 张安泰(540)
- 一个公文皮包的故事 苟金元(542)
- 我在榆中县北山组织游击队的经过 葛贤辅(546)
- 我配合军管会迫降了韩起功 任廷栋(549)
- 难以忘却的经历 杨翠兰(555)
- 三次死里逃生的回忆 胡秀英(558)
- 我被活埋的前前后后 李桂珍(562)
- 我是死人坑里的幸存者 黄科林(563)
- 我从“万人坑”逃出的经过 姚芝贞(565)
- 马步芳匪军残害红军的几种刑法 罗阴山(567)
- 马步芳匪军的兽行 向翠花(568)
- 我遭受马家军劳役折磨的经历 冉继忠(569)
- 青海老乡救了我的命 贺颜太(571)
- 青海乡亲搭救我出苦海 郭富财(574)
- 为活命装聋作哑十二年 刘思贵(578)
- 国民党反动派残杀了我全家 肖汝存(582)
- 我们在“新剧团”同马匪坚决斗争 刘明清(584)
- 流落海西草原十二年 廖永和(586)
- 我降伏马元海等人的经过 兰彦明(595)
- 永远忠于党 马秀英(600)

- 回眸血染的征程 李天榜(604)
回忆西路军失败后的艰苦历程 何正银(607)
西路军失败后的坎坷历程 刘金成(609)

参考资料

- 一份被扣发的“十万火急”电报 熊维邦(613)
红九军军长孙玉清将军英勇就义 陈秉渊(615)
西路军孙玉清将军遇难经过 韩德庆(620)
韩起功杀害高金城医师纪闻 赵述(623)
新二军“补充团”是血泪斑斑的集中营 陈秉渊(625)
马步芳“补充团”迫害蒙难红军的罪行 孟全禄(629)
西路军被俘人员在“新剧团”的情况 绽永贵(633)
- 本书资料来源主要书目 (638)
后记 (642)

营救西路军二三事

吴鸿宾

这是40多年前的事了，每当我回忆起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周恩来、谢觉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党为国深谋远虑、运筹帷幄的革命气魄，以及关心、爱护革命同志的精神，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他们那高大的形象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

(一)

1936年底，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刚刚解决不久，西安这座古城虽已是北风呼啸、地冻天寒的一派严冬景象，可是，在人们心里激起的那股民族抗日图存的暖流，却犹如灼热的岩浆沸腾、激荡。

当时，我正在西安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西安的街头巷尾、茶馆酒楼，人们把西安事变当作话题议论纷纭，久久不息，特别是对中国共产党派到西安解决事变的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代表团，更是让人以敬佩的语调，绘声绘色地谈论不已。中共代表团带来了抗日的新曙光，人们受到无限鼓舞。就在这时，一件繁重而我没有料想到的任务，党组织要我来完成。

一天，杜斌丞先生来到广济街一号住处找我。我一如往常地接待了他，彼此随便谈了几句平常话以后，我就问他的来意，他只是平静地回答说：“没啥大事，我告诉你，将有位姓张的同志来会你，有些事情跟你商议。”从他的语气里我听不出什么异常的地方，可是，在他那神情之中却使我察觉出似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急切地问他：“哪位姓张的？他是什么人？”就在这时，我一面想问个究竟，一

面在记忆里搜寻我所能记起姓张的熟人。杜先生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说:“这位同志,你不认识。其实,他倒不是位主要人物,是他要领你去见另一位朋友。”这样一来,更使我感到迷惘了。我还想再问个究竟,后来一想,像从事我这样工作的人,追根问底就不太合适了。

杜先生离去不久,果然有人来访我,但不是一位姓张的同志,而是两位张同志:一位叫张文彬,另一位叫张子华。由于杜先生事先打了招呼,我当时并不感到突然。经过交谈,我知道了他们是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的同志。于是,我不由想到:莫非他们带我要去见的那位朋友是——不会的,周恩来同志肩负着党的重任,日夜为团结抗日大计操劳,会见我这样一个普通党员似无可能。就是怀着这样矛盾的心情,我随他们到了西安办事处。

在一间不太宽敞却很洁净的房子里,有几件简单的桌椅井然有序地摆在房子四周。不一会儿,张文彬同志从另一房间陪同一位步履轻快、仪态从容、面露微笑的中年人走来。张文彬同志向我介绍说:“这位是周先生。”这时,一双热情、有力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来了,请坐。”他亲切而随便地指着靠窗的沙发让我坐下叙谈。这时我略感到有点紧张、慌乱,因为这是我曾预料但认为不可能的事,所以我还是免不了感到有些突然而又惊喜。

啊!这就是我久已仰慕的周恩来同志呵!我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白色恐怖下,在极为秘密、隐蔽的情况下,曾会见过许多位我们党的负责同志,但都是地方上的领导人,像会见周恩来同志这样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这是我万万没有料到的。这就是1936年末西安千家万户、妇孺童叟人人传颂、万人景仰的周恩来!此刻,坐在我身边的正是举世闻名的人,他穿着一身洁净的藏青色中山装,朴素、庄重,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两道浓眉下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目光,给人以鼓舞和力量。

周恩来同志面带微笑地看着我,亲切地询问:“你在这里呆的时间很长了吧!在本地你认识回民中的一些朋友吗?”从他那略带江

北口音的语言里我意会到，周恩来同志所问的是指一些有影响的回民中的上层人士。我回答说：“有一些，但都不是名气太大、社会地位很高的人。”周恩来同志听了以后爽朗地笑了起来，说：“想一想看，也不一定非是大人物不可。”这时，我还体会不出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意思。周恩来同志又对我说“是这样的——”此时，他脸上显出有些焦虑的样子，说：“有这样一件事，是党很关切的一件事，你可能听说了吧？我红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处境很不好，很危急，要想尽一切办法去营救他们。想想看，看有没有能和那边谈上话的人？”

周恩来同志稍停片刻后接着说：“这件事情请你和张文彬同志商量一下，在回民中找个关系可靠的人，能向那边传达我们的意思，对被围困的红军只要不伤害，对那边条件可以答应，要紧的是要尽一切可能，保全住这几百人的性命。”在说这一席话的时候，周恩来同志的目光一直看着我，仔细地看我有何反应。我急忙回答说：“请周先生放心，我一定尽力找这方面的人。”这时，周恩来同志向张文彬同志交代说：“这件事你认真办一下。”

当我告辞的时候，周恩来同志握着我的手说：“看有什么困难，哪些问题需要我们解决，请告诉张文彬同志。”离开办事处，张文彬、张子华同志陪我回到住所以后，向我详细介绍了关于红西路军的情况：红军第五军、九军、三十军组成红西路军，在甘肃靖远附近渡过黄河，结果受到敌胡、马军十三个旅和地主武装的围攻、堵击。我军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一无补充，二无装备，面对拥有骑、步、炮兵的敌人，虽然打了几个胜仗，但我军也损失很大。后来，青海马步芳的主力部队从扁都口插过来，把红军分割成几部分，使红军陷入困境。这次我们要去营救的是被围困在张掖黄番寺的500名红军指战员。

经过我和张文彬、张子华同志仔细商量，决定刻不容缓地找一位可靠的朋友去河西进行营救。可是，有谁可以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呢？在送走张文彬、张子华同志以后，我反反复复地把我在西安的一些回民朋友考虑了一番，我想到一位相识的朋友，此人就是马德涵

先生,他60多岁,当过小学教员,曾在西安回教促进会工作过,住在羊市街72号,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由于我们都是回民,又知道他为人正派,政治上是可以信赖的,因此我们彼此有交往。这时,他已赋闲在家,因生活困难,以卖画为生。

我了解他与马家有些关系,再就是他擅长书画,同时与回民中的某些知名人士也很熟稔。他与当时的青海省主席马麟也有结识,偶有往来,与马步青还有师生之谊。在此仓促紧迫之时,我连夜走访了马德涵先生。开始,我还不把事情和盘亮出来,只是试探性地说,是我的几个朋友,在张掖被马家队伍围在里边,可否能通过马步青代为疏通一下。谁知这老汉竟满口答应下来,只说是年事已高,去张掖路上交通问题咋个解决,我见事有了眉目,便说交通问题等我明日找人设法解决。

走出马德涵先生家,夜已很深,路上行人稀寥,寒风刺骨,但我却非常兴奋,恨不得马上去找张文彬同志告诉他这一情况。翌日一早,我就把马德涵先生答许之事作了汇报。我提出由张文彬同志亲自与马德涵先生会晤一下,经过商量,张文彬意见还是让我去见,并转告马德涵先生这是周恩来先生所托,请他只是带去个口信,说明只要不伤害被围红军,可以要枪给枪。关于去张掖的交通问题,张文彬说可以解决。

当我再次去会马德涵先生时,我就把事情的真相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当他听到这是周恩来同志殷切嘱托之意时,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直呆呆地注视了我好一阵子,又开口说道:“啊!这怎么敢当?想不到周先生这样信赖我,我怕……”

我诚恳地说:“马先生,这事是关系到几百人生死的大事,我们请您再三考虑,但愿不会为此给您带来什么麻烦。”马先生听后纵声大笑,很动感情地说:“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我马某已是花甲之年,此事不足为虑。我佩服共产党,这次‘西安事变’人所共见,共产党不记仇,明大义,救民族于危亡,团结人民抗日。周先生为人我非

常敬佩,此次蒙周先生如此器重,莫说担些风险,就是为此拼上性命,也是值得的。”老汉这一席话,真是感人肺腑,令人肃然起敬。

后来,张文彬同志把此事详细地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意见:事要抓紧,最好早日动身。并且叮嘱张文彬说,马先生年岁大了,耳朵又不灵便(当时人称马德涵为马聋子),最好再找个人路上好有照顾。

谁来陪伴马德涵先生去甘州最合适呢?事有凑巧,我的一位至交马宪民正好在西安。马宪民,海原人,他父亲是做皮行生意的,结交也比较广,跟我的关系也较深,当年马宪民在天水读书时,就住在我家里,有时他父亲来西安办事,总要到我家里探望。我想,如果由马宪民陪马德涵先生去甘州,那是最理想不过了。我找到马宪民说明来意后,他也颇感意外,但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因为他与马德涵也是熟人,互有往来。

接着我就为他二人买了去武威的飞机票。马德涵先生得知马宪民为伴同行,又可乘飞机前去,非常高兴。老汉说:“平生第一遭坐飞机,去凉州虎口救人,就是牺牲了,也值得哩!”马德涵二人飞抵武威后,立即去会见马步青。由于有师生之谊,马步青接待还客气,马德涵婉转地说明来意后,马步青颇感惊异,但也未深问根底,答应可以解决,并亲自介绍马德涵先生去张掖见旅长韩起功。他二人又乘车赶赴张掖,韩见是上峰介绍而来,接待尚佳。他告诉马德涵先生说,黄番寺被围的红军已经解除了武装,对人员也未加伤害,不久前已送青海去了。

一周以后,马德涵与马宪民返回西安,由张文彬把此行结果向周恩来同志作了汇报。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不计年迈,长途跋涉表示感激,并对此行结果感到满意。因为,这次张掖之行,在营救红西路军同志工作上起了一个缓和作用,目的已经达到。

解放后,周恩来同志对马德涵先生还念念不忘,曾给陕西省委打过招呼。后来听说马德涵先生生活上有些困难,还汇过钱来资助;知

道马先生耳聋,还特意送来一个进口的助听器。

(二)

马德涵从武威返回西安几个月后,我总是担心着流散在河西、青海的那些落入敌手的红军战士的命运。

1937年4月,西安这座古城已是翠柳吐絮的时候了。我得知青海省主席马麟朝圣回来,途经西安,并在此停留一段时间。他住在当时西安一家很像样的旅馆——桥梓口的天安栈。这家旅馆常作为一些有名望的人物来往驻憩之所。随马麟同行的还有青海省府的秘书长谭克敏等人。

当我得知这一情况后,心想:这是一个建立工作渠道、搞统战关系的机会,通过马麟可以结识一些人,也许还可以通过马麟在那边安插个职位,那对我们开展工作不无裨益。我把这一想法向张文彬同志讲了,他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认为马麟刚从南京回来,对国民党南京政府可能了解一些情况。另外,把马麟的工作做好了,他回到青海对我们工作也有好处,甚至还可以利用这个关系,找机会进一步摸清红西路军的情况。我们商量以后,就约请马德涵先生同我去拜访马麟。

马麟个头很高,看样子有60岁了,留有山羊胡须,头上戴回民白帽,身穿深灰色绸长袍,沉静寡言。由马德涵引见后,我作了自我介绍说,我曾在天水给邓宝珊当过秘书。闲谈时,马麟也谈到他曾去过天水,由此话题又谈了一些天水的情况。因为是初次相见,我们只是作了一般的寒暄,为以后接近做些准备。

事后,我又同张文彬商量,打算宴请一次马麟,同时请周恩来同志参加,趁便与马麟会见。根据了解的情况,知道马麟虽为青海省政府主席,但并未掌握实权,他为人比较开明,我们都觉得可以安排这样的会见。

可是，在哪里会见好呢？马麟是当时的青海省政府主席，让他到七贤庄去会见周恩来同志不妥；如果让周恩来同志去桥梓口会见马麟，在那样环境中会对马麟的处境不利。商量的结果，还是以我和马德涵的名义请马麟吃饭，在宴会上让他们会面为好。我们决定事先暂不把周恩来同志也出席宴会的事告诉马麟。此事由张文彬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周恩来同志表示同意，决定与马麟会见。

于是，我和马德涵就给马麟和谭克敏发了请帖，在桥梓口的天锡楼回民餐馆包了一桌酒席，叫送到西羊市街马德涵先生的住所。这地方是当过县长的马子健的房子，所以要选在这里，一来环境清雅安静，二来不为外界注意，便于谈话。这一天，周恩来同志与张文彬先马麟而来。时近中午，宾主人席间，马德涵请出周恩来同志向马麟介绍说：“马主席，我向你介绍一位朋友——”他这时指了指刚刚步入室内的周恩来同志，说：“这位是周恩来先生。”马麟乍一听吃了一惊，神情有些不安，但很快又镇静下来，连忙伸出手来，向周恩来同志说道：“啊，幸会，见到周先生太幸会了！”这时周恩来同志显得非常自然，很随便地和马麟握手致意，说：“马先生这次朝圣回来，辛苦了！”宾主寒暄过后，相继入席。

席间，大家边吃边谈。起初，马麟和谭克敏还有些局促不安，等他们发现周恩来同志那样平易而豪爽、坦荡后，气氛渐渐和缓自然了。我记得当时马麟向周恩来同志提出了关于抗日的一些问题，周恩来同志很扼要地把我党团结抗日的一些主张向马麟作了说明，总的是希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团结则存，分裂则亡。马麟听得很入神，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从他的表情看，他对周恩来同志那言简意赅的见解，表露出钦佩之情。谭克敏偶尔也插些问话，显得不那般拘谨，而变得轻松起来了。宴会期间，自始至终，周恩来同志从容自若，侃侃而谈。马麟也表示，团结抗日有好处。这次会见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由于事先和房东作了安排，庭院宁静，绝少干扰。

散席后，周恩来同志与马麟握手道别。当我们送客人到巷道时，

看见外面围了很多人,正在悄声议论。好在这次会见聚得突然,散得快速,没有被国民党特务发现,但这件事在回坊中震动很大。事后,张文彬同志让我到马麟那里看一看有什么反应,于是我趁回民做礼拜去会马麟。礼拜毕,在一间小礼拜室里,我们打了招呼,寒暄一会儿以后,我把话题引向那次会见的事,我随便地问他:“马主席,前次吃饭,你对周先生印象怎样?”马麟听我提起这个话题,向两旁环顾了一下,稍想了想说:“啊,很好!很好!周先生是个很有学问的人。”说到这儿,他伸出大拇指,轻声地向我说道:“周先生是共产党的了不起的人才,有远见,也很健谈,我是很钦佩的。”

那次会见,在马德涵住处的群众中也引起了不寻常的反应,不少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是共产党摆的“鸿门宴”,担心这下子非把马麟抓起来不可;还有的人怕闹出乱子来,出危险……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到,他们所担心的事根本没有发生。他们所看到的是客人们友善谦恭地握手告别的情景,那些人才松了一口气。有人不胜惊奇地说:“看不出来呀,这聋老汉(指马德涵)还有这一手哩!”从此,人们对这个平日默默无闻、卖画度日的老汉另眼相看了。好久好久,人们在街头巷尾还议论着这件不寻常的新闻。

(三)

宴请马麟以后,张文彬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要我到青海西宁去了解被俘红军的处理及待遇情况。为了取得合法身份,我向马麟提出想去西宁找个事做,请他给马步芳写个介绍信,马麟当时很痛快地答应说:“好,我给子香(马步芳的号)写个信。”于是当面吩咐谭克敏写了介绍信。不几天,我就带了马麟的介绍信去青海了。

到西宁以后,我住在毛顺皮毛厂我的一个亲戚家里。西宁,这个西北高原的边远城市,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显得十分萧条。我找到了古希贤(马步芳的秘书,汉中人,曾当过县长)、马霄石(马步芳儿

子马继援的老师，甘肃徽县人，曾任过西宁县县长），由他们把我引见给当时青海省政府代主席马步芳。那天，在马步芳接见一个客人时，把我也同时接见了。因为我是他叔父马麟介绍来的，他的态度还是很客气的。

因为我曾听马德涵说过，在被俘红军中有些是文工团的团员，还有妇女和娃娃，所以在那次会见时，我特别留意那里一些人的举止，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正好，接见不久，马步芳就叫他的歌舞团表演节目，我发现这些表演歌舞的正是被俘的红西路军的一些文工团员。其中，我今天还记得的一个女演员的名字叫黄国秀^①，她在当时是演得很出色的一个（以后听说她的结局很惨）。对这次演出，因为我心里感到很难过，所以当时并无欣赏歌舞的心情，只是装作很有兴致的样子。

在这次接见时，由于马步芳早已得知我们在西安宴请马麟的事，因此对于我的工作安排问题婉言谢绝了。古希贤、马霄石对我说：“马主席说，我们这里范围小，地盘也不大，恐怕不能使吴先生有所施展，等以后再说。”对这件事，以后我从侧面听到马步芳曾给马霄石说：“这个人很厉害，用不得！要谢绝。”

在西宁找工作的希望落空了，我又用几天工夫，通过明访暗察，了解被俘红军情况。我了解到：孙玉清军长被俘到青海后已被杀害，有的干部还被关押着，有一部分被俘的红军被他们改编成军队在乐家湾训练，待遇很坏，在严冬里连帽子都没有。此外，在澡堂、饭馆，我亲眼看到一些年轻的红军在给顾客递毛巾、擦背，当了堂倌、勤杂，有的还被送到皮毛厂里当工人，看守很严，不好接近。

8月，我返回兰州，向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党代表谢觉哉同志汇报了这一情况。谢觉哉同志以极其关注的心情听完我的汇报，并告诉我，目前党组织正积极设法继续营救他们。以后我们党做了大量工

^① 根据王定国、毓永贵等人回忆，此女演员名黄光秀。

作,通过各种关系,采取各种办法,把失散或落入敌手的红军干部、战士营救收容,使很多人都得以重返革命岗位。

原载《陇原星火》,作者吴鸿宾同志,回族,甘肃天水人,生于1902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到西北地区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兰州市军管会副主任、甘肃行署副主任、兰州市市长、甘肃省政协副主席、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